

“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学术研讨会综述

徐志民 夏卫东

由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民国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贵阳学院科技处、政教系、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中心、贵州省史学会协办的“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月8日至12日在贵阳学院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杭州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省史学会、贵阳学院等多家单位的近4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围绕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史料方法论、专题史料现状、区域史料情况和个案史料推介等内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为进一步发掘、搜集、整理和利用与抗日战争相关的新史料及既有史料和史料成果,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史料线索和努力方向。

一 史料方法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在介绍了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馆藏史料,以及近代史研究所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哈佛大学胡佛研究所之间建立的“资料互换”关系后,根据组织和参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经历,重点介绍了中日两国学者之间在史料的选择、解读和关注点方面的差异。他以九一八事变为例,指出:中日两国学者在研究中大都倾向于使用本国的史料;较少或几乎没有使用对方的史料;即使使用相同的史料,但因关注点不同,解读也就不同,判断自然各异。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造成中日两国学者之间在一些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强调论述历史过程中诸事件的连续性、必然性时,引用史料的真实客观和全面完整是基本的前提,不应因强调某些事件的非连续性、偶然性和外因,而忽略对构成历史进程发生的根本性质的研究与分析;当然,重视实证研究并不等于可以以实证研究取代所有的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萍,指出了抗战研究中利用史料应该注意避免的两个问题。一是运用史料单一问题,主要包括史料来源和史料形式的单一。史料来源单一主要是指目前仍有相当一批与抗战有关的史料,如蒋介石档案、蒋介石日记等尚在台湾、美国等处,不少大陆学者因条件有限而无法查阅。史料形式单一主要是指随着口述史料、影像资料的兴起,而从事抗战研究的学者利用这些史料的并不多。二是史料利用的不规范问题,主要包括:1. 一些学者缺乏对史料进行认真阅读、咀嚼和消化的耐心,在研究中不去阅读原始资料,而直接引用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二手资料,这不仅造成研究的不深入,而且容易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2. 史料的校勘、对比、鉴别工作做得不够。她指出,在抗战研究中,必须对史料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

江苏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郭昭昭,从教学与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在抗战研究中要平衡新材料与新问题,扩大抗战史研究的话语权。他认为:对新材料和新问题不能是此非彼或厚此薄彼,过于强调新问题,没有新材料的支撑,这脱离了学术的根本目的;过于强调新材料,缺乏问题意识,容

易失去学科的话语权。他建议抗战史学界充分结合电子网络时代的知识获取特征,将抗战史史料分批电子化、网络化,便于学者和大众获取;同时,提出就抗战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以史料为支撑,以专家学者参与为后盾,将其拍摄成真、善、美结合的纪录片甚至文艺片,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使用,并便于社会大众获取抗战史的相关知识。

二 专题史料现状

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分别搜罗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国外涉及国民政府防空建设的史料,并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目前学界关于该问题研究的不足。即,1. 对于国民政府战前全面的防空战略部署和战争过程中战略调整研究的既不充分,也不够系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加强对这一问题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还有较大的空间。2. 从战时防空的区域研究来看,对南京、西南地区的重庆和四川等地的研究比较集中,探讨得比较深入,而对其他区域战时防空的研究相对来说还不足。3. 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较多地关注到了国民政府积极防空的一面,特别是对于中日之间的空战,有不少论著已经研究的非常微观,相比之下,对于地面防空部队的防空以及消极防空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很多成果还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事实介绍,缺乏学理层面上的深入分析。4. 对于实施空袭的主体——侵华日军的陆海军航空部队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目前的研究也相对较弱,有待进一步加强。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高晓燕,根据自己长期研究侵华日军化学战、毒气战的经历,介绍了中日两国学者所搜集到的、有关侵华日军化学战、毒气战的口述史料。她在走访侵华日军遗弃毒气弹受害者后,更增强了搜集与此相关口述资料的紧迫感,并为此呼吁政府和研究机构高度重视,积极寻访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者和日军遗弃毒气弹受害者,抓住最后时机,再抢救一批日军侵华史料。

杭州师范大学潘国旗,分抗日战争前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个阶段,介绍了抗战经济史的史料出版和研究现状,指出目前抗战经济史研究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以下两个方面尚待进一步加强。第一,由于研究对象和内容所决定,战时经济史的研究,主观揣度和建构的空间十分有限,在这些领域,学术研究的最大工作量,就是资料的收集、评判和利用;但战时经济史的文献或文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难度较大,是一项耗神费力而又难以收到实效的工作。加之,受抗战时期的恶劣环境影响,战时经济史的有关资料相对较少而且分散,收集整理的难度更大,因此,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每位研究者的努力,而且需要借助集体的力量。目前,已整理出版的档案资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散落在各地档案馆和散见于报刊杂志中的大量有价值的战时经济史资料还没能整理出版,研究者们难以利用。第二,在抗战时期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所保留的大量经济史料,存在不少伪造的、歪曲的、不准确的内容,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之进行考据、辨伪、校勘,以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薛玉琴,重点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教育的史料存留情况,并从研究抗战时期教育的学术现状,对相应的史料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1. 目前史学界不少学者整理及编辑的重要资料,还没有引起教育史学界足够的重视和使用。如,丁守和、马勇、左玉河等人编集的《抗战时期期刊介绍》一书,其中就有很多关于教育方面的资料与信息。但目前很少见到教育史学者征引和利用。2. 应扩大史料概念范畴,注意把反映当时教育界多重生活的重要档案资料、文艺作品及口述文献列入史料范畴,包括当时教育界及教育界之外人士记录教育界的日记、回忆录、时论,甚至创作的反映教育界生活的文艺作品等。如,商金林编辑的《叶圣陶抗战时期文集》(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就记载了不少抗战时期的教育界事件和言论,以及叶圣陶对抗战时期中国教育问题的观察与思考。3. 学术界,特别是大陆与台湾学者应尽早联手编辑推出一些重要专题的

教育史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徐志民,主要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相关史料。如,抗战时期日本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大学、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立公文书馆、东洋文库等馆藏与中国留日学生相关的资料;保存于战时沦陷区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和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战时中国留日学生史料,以及留日学生本人的日记、回忆录、文艺作品等;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教育者和管理者、中国的留日学生选派机构工作者和驻日留学生管理者及留日学生的口述史料;还有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有关战时中国留日学生的史料。他还总结了抗战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史料的主要特点,即:1. 与抗战爆发前的中国留日学生相比,规模并不算小的战时中国留日学生的史料非常丰富,但整理出版的较少,利用率较低,这也是抗战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成果不如战前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成果丰硕的重要原因。2. 日本国内的战时中国留日学生史料相对系统,并大都已经电子化和网络化,利用起来相对方便;而中国国内涉及抗战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史料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3. 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口述史料,以及中国的留日选派机构工作者和驻日留学生管理者的口述史料较少,尤其是中国留日选派机构工作者和驻日留学生管理者的口述史料更少。4. 抗战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口述资料,已受到中日两国学者的重视,并开展了单独或联合的搜集口述史料工作。5. 抗战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史的研究者,目前对散落于世界各地关于抗战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史料关注不够。如,很少有人利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Gordon W. Prange Magazine Collection(即普兰格文库)中所保存的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机关报。因此,应充分利用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有关中国留日学生的史料,以及中国各地所藏其他史料,并加紧口述史料的搜索和整理工作。

三 区域史料情况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李淑娟,在宏观介绍东北沦陷史研究的主要史料后,重点从微观上介绍了“满铁调查资料”。她指出:满铁调查的内容包括气象、土地、人口、劳动、矿业、工业、农业、畜产、林业、水利、盐业、土木、交通、通讯、财政、金融、商业、贸易、物价、专卖、海关、文化、教育、卫生、宗教、警务、司法等诸多方面,可谓是“包罗万象”;调查的范围以东北为重点,进而关内,再至世界,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尼,远至欧洲和北美,可谓是“无所不及”。目前,满铁资料主要保存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辽宁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大连市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等处。2007年,东方出版中心虽推出了30卷本的《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为满铁资料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线索,但满铁资料在利用方面仍存有一些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满铁资料的利用率并不太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点:1. 印刷质量不高,极易破损而导致辨认困难;2. 很多满铁资料原文是装帧简单的手稿、抄稿、打印稿、油印稿、铅印稿,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仅是简单的复印成文,没有进行深层的加工和分类整理,查找非常困难;3. 满铁资料多以日语成文,印刷字号太小,字迹不清等,也限制了人们的阅读和使用。她呼吁将高科技手段引入到浩瀚的满铁资料的开发和管理中,以最便捷的方式提高满铁资料的使用效率。

安徽大学历史系陆发春,以安徽抗战时期的舆论动员和安徽抗日战争的历程为例,对史料挖掘和区域抗战史的特征进行了探讨,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就区域抗战史所呈现的特征来说,史料的挖掘还有待深入。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区域抗战史研究受到中央级学术机构的影响很大,无论是著述结构、学术立场、观点表述等,基本上是模拟多,个性少,区域抗战史特征不鲜明。这样的历史撰述,无助于全国抗日战争史的宏观提炼和学术提升。因而,他提议要重视地方特色,深入挖掘区域抗战史史料,并认为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史料问题当下可行的一个深入路径。第二,重视抗

战史史料的逻辑解读,重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转型。没有史料,当然难有史学成果,但有史料也未必出好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史学界开始重视社会史、文化史研究,重视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新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结合,这些学术观点对抗日战争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他认为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研究,也是对史料寻求一个更加合理的历史解释。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夏卫东,以抗战时期浙江省政府颁布的户政法令为例,就抗战时期的户政史料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根据1937年的《浙江省各县市民力统制案》、1939年的《浙江省户口总检查办法》、1940年的《非常时期重要城市户口查报登记暂行法令》等文件,认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户政机关是政出多门、法令繁多而混乱,户籍行政基本上停滞不前。1941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户口普查条例》后,全国各省奉令一律举办户政,自此户政由停滞不前进入到统一开展的新时期。1942年后,浙江的户政法令相继统一到国民政府中央的户政体系之中。他指出:虽然从当时的各种档案、文件等看,国民政府的确在抗战时期完成了户政法令的近代化进程,对户政的认识也达到了近代意义的水准,但也应看到,各种法令的颁布不等于事实上的执行。抗战时期,大面积国土沦丧,时局动荡,政府的法令、政策只能在有限的地方执行,而且各地执行的力度也不一样。更有甚者,有些法令或政策仅仅停留在纸面之上,根本就没有执行。因此,在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既要用法令、政策等史料作为论据,更要关注这些法令或政策是否得到了有效执行。

贵州省史学会会长熊宗仁,强调了贵州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主张“贵州在抗日战争研究中不应该被边缘化”。他指出自国民政府准备抗战以来,贵州的军事战略地位愈发重要,特别是豫湘桂战役时日军一度侵入独山,使贵州既是抗战大后方,又一时成为抗战前线,因此,作为陪都重庆的南屏障,贵州曾一度跻身中国政治、军事、交通、经济、文化的主流地区。如,在抗战时期的内迁大潮中,不少机关、学校、企业都曾迁入贵州,许多学界名流、文人墨客和科技专家都曾到过贵州,给贵州近代社会的变迁带来了巨大影响。但是,国内抗战史学界,甚至贵州本地的学者,对贵州抗战时期的史料挖掘、研究都很不够,甚至一些史料长期无人问津,以致在研究抗战时期贵州的某些方面还存在不少盲点,甚至出现片面观点。如,贵阳是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贵州省和贵阳市档案馆的相关档案资料非常丰富,但系统整理和研究都还不够;截止目前,某种程度上仍存在忽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贵州当局及民间组织的抗日斗争倾向。他认为:“这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不是某党某派的抗战。如何真正体现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这不仅是贵州史学界,也是中国史学界的责任。”

四个案史料推介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生,根据自己查阅“蒋介石日记”的心得,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蒋介石日记”的内容,肯定了“蒋介石日记”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亦强调不应过分夸大“蒋介石日记”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赞同一些论者所言“蒋介石日记”有“改写中国近代史”之功效的说法。接着,他先后从史观和历史研究的事实两个层面进行了阐述。第一,从史观层面说,“蒋介石日记”中充斥着英雄史观。他以蒋介石1945年10月某“上星期反省录”称:“共毛十一日飞回延安,彼虽罪恶昭著而又明知其必乘机叛乱,将为统一之大碍,但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为例,指出自诩为英雄的蒋介石日后受到了历史的嘲弄,因此,破除英雄史观,中外历史学家已经取得非凡的成就,独独蒋介石为例外耶?第二,从历史研究的事实层面说,“蒋介石日记”也未能达到“改写”中国近代史的地步。他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中共态度为例,指出早期的研究成果,在阶级斗争学说统领之下,认定蒋介石抗战一结束,就以消灭中共为首要目标;根据“蒋介石日记”的内容,可知蒋介石在抗战结束后确实也以中共作为首要目标。因此,“蒋介石日记”并未“改写”这一时局关键的史实,反而证实了他本人的历史惯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晓娟,介绍了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和“日本与世界”数据库中所珍藏的历史资料及其检索方法。“日本与世界”数据库是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松田康博等人牵头,在文部省和日本学术振兴会支持下,正在建设的大型数据库。目前,该库由日本政治与国际关系数据库、20—21世纪年表、亚太各国对外政策、省略语数据库四项组成。其中,日本政治与国际关系数据库系统地收集了与日本政治及日本国际关系相关的基本资料;20—21世纪年表数据库对1900—2006年12月间的世界局势及日本国内局势进行了详细整理,只要设定时期和检索关键词,就能自动形成年表;亚太各国对外政策数据库汇集了亚太地区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相关的文献目录、基本资料、专家研究成果等。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于2001年11月30日成立,设在国立公文书馆内,通过互联网向读者免费提供保管于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档案文件的数字化版本,即自日本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日本与亚洲邻近各国相关的重要资料。截止2008年1月,该中心已公开的图象为1430万张,目录数据库为103万件,今后还将继续增加。该中心的检索方法非常便利,提供多种检索方式。如,可以根据原始资料收藏机构的分类方式寻找资料(阶层检索),也可以通过资料中包含的事件、人物、场所、时间等关键词查找,并可以进一步缩小关键词范围进行“关键词详细检索”,还可以直接调出参照过一次的资料的查询编码进行检索等。其所有图像资料都通过DjVu形式压缩,不降低图像质量,以便于阅览。

贵州省档案馆韩义义,主要介绍了贵州省档案馆的馆藏史料情况,突出强调了其馆藏史料中关于抗战时期贵州省史料的重要价值。他介绍说:“贵州省档案馆现保存有清代、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档案、资料47万余卷(册),其中民国时期的档案有18万余卷。在民国时期档案中,自辛亥革命至1935年军阀统治结束时的档案约有1.5万卷,其余均为1935年至1949年的。”由此可见,贵州省档案馆所藏抗战时期的史料在其馆藏资料中占有较高的比例。他认为:抗战时期,由于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大量的机关、学校、部队迁入贵州,沿海等地的民众为避战乱也来到贵州,为贵州战时的繁荣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当时贵州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的发展。因此,战时贵州省各部门、各单位,都积累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抗战时期贵州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这些史料对研究贵州抗战史和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目前,贵州省档案馆利用自身优势,组织人力,采取自编和与有关单位合编的形式,出版了一些编研成果,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勇,作为“日本侵华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的主持人,重点介绍了该项目的主要内容、研究意义,并从中日双方学术动态的比较中阐释了该项目设立的必要性。他指出:已于2010年正式启动的该项目,是以日本军政当局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为中心,全面梳理相关史料,研究其决策与行动过程,揭示其基本性质和特点规律。其研究意义在于为进一步综合整理海内外史料与研究成果提供服务,以推进学界的相关研究,更好地回答为什么会出现日本侵华、日本侵略责任何在等重大历史及学术问题。至于该项目设立的必要性,他认为日本对战争历史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力量,集中在外务省、防卫省与各大学,人员队伍齐整。其考察范围不仅深入到各专题个案,尤详尽于全局高层政策与战略问题,所获支持经费充足,工作全面深入持久,成果数量庞大相对而言,中国两岸学者尤其是大陆学者,虽在日本侵华战争罪行资料、满铁史料等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在日本侵华高层决策方面研究薄弱,而且相关研究经费不足。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造成国内学者对日本右翼怪论批驳不够,以及欧美等国际社会对理应了解的日本侵华战争责任多有不解的原因之一。因此,设立该项目,就是要中国学者真正担负起通过资料整理以强化学术研究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学通,作为“抗战影像资料数据库”重点课题的主持人,详细介绍了抗战时期影像史料的搜集情况,并就建立抗战时期影像资料数据库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首先肯定了影像史料的学术价值和史料地位,认为影像史料作为史料的一种,具有补充文字史料之不足、印证文字史料所描述历史的真情实况、纠正文字史料有意或无意错误记录的功能,可以使人们“直接面对”历史,获得直观印象和感受,是传统史料之外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资源。其次,他指出已出版的抗日战争影像史料主要存在三点不足或缺憾。一是数量不多。抗日战争时期摄影技术已相当成熟,许多中外记者和摄影爱好者拍摄了大量照片,与其存世数量相比,目前重新整理出版者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则更为少见。二是相互重复者较多。在为数不多的已出版的各种抗日战争图片集或各地抗战纪念馆中,存在着不少图片相互重复的现象。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极有价值的影像史料还沉睡在档案馆、图书馆中,不为人知,更鲜有利用。三是已面世的影像史料中,存在许多不能被准确辨识或张冠李戴的错误。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和学术界对抗战题材的历史图片有相当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缺乏对此类史料的系统发掘和整理。最后,他为此提议设立一个国家级的抗日战争影像资料数据库,以系统地征集和收集这方面的图片资料,并规定图片质量的标准,对图片的作者、拍摄时间、地点及内容等尽可能地进行考证、鉴别和著录。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无版权争议或版权处理妥当的抗战影像史料在互联网上发布,供普通民众获取知识和学界同仁研究之用。

(作者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夏卫东,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